

特稿

本报记者 王倩

感染了犬细小病毒的小狗被送往宠物医院救治,最终恶化死亡。宠物主人认为医院救治不当时,发起诉讼。为厘清责任,宠物主人申请司法鉴定。

为小狗申诉权益的代理律师邓凯记得,对方代理律师在司法鉴定听证会上直言,“为了一条狗弄成这样至于吗?”

从业27年的邓凯察觉到,近一年多来,年轻人的宠物维权咨询愈发频繁。他们大多是Z世代,带着互联网原住民的特质,不接受“宠物只是财产”的传统定义,更敢为情感价值较真。

这一变化背后,是养宠群体的代际更迭与观念转变。相关数据显示,2024年我国宠物猫狗数量已突破1.24亿只,90后和00后占到宠物消费市场的67.7%。

养宠人数增长,人和宠物的关系越来越近,宠物买卖、医疗、寄养等产业链不断延伸,与宠物有关的纠纷数量逐年上升,也让“宠物律师”这一群体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。他们多是年轻的Z世代养宠人,一边用专业为宠物维权,一边推动行业合规。

在为宠物据理力争时,这些年轻人一遍遍重申宠物在主人生命中的不可或缺。他们对陈旧的系统、模糊的规则感到不适,也不满足于个案的解决,试图用自身行动去填补空白,甚至改写规则。

专属社群

蛋蛋被咬伤的那天,是一个周六下午。小狗做完美容,汤圆和男友牵着它在小区里散步,与一位牵着柴犬的老人对向经过,中间保持了一米距离。

没有警告、没有低吼,柴犬突然冲上来。虽然牵着绳,但对面前老人的力量还是无法拉住,柴犬用力咬住蛋蛋头部正中间,汤圆尖叫起来,看着小狗昏迷过去。

赶到宠物医院检查后,汤圆得知,只短短几秒钟,蛋蛋被咬成了颅骨骨折,碎骨插到了颅脑里。医生告诉她,蛋蛋伤得太重,即使做手术抢救也不敢保证成功率。

钱没了可以再赚,“如果我不去救,蛋蛋就再也回不来了”,汤圆不想留遗憾,选择继续抢救,但是在颅骨修复和清创手术的第二天,蛋蛋还是走了。

为了抢救小狗,汤圆前后花了两万多元医疗费,她想让柴犬主人全额赔偿。但对方认为,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,之后的抢救就是过度治疗,不肯赔偿。

“做抢救决定之前,我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?”汤圆坐在律所的会议室里讲述经过。同为养宠人,律师邓凯很能理解她当时的心情,“如果把你换成你的亲人,你救不救?”

但邓凯还是向汤圆讲清了诉讼风险:在目前司法实践的共识中,宠物通常被视为财产。这意味着诉讼没有多少“性价比”,蛋蛋的抢救费可能不回来多少,她还要支付诉讼费、

为“毛孩子”打官司的年轻人

完善“规则”

生活总要继续,蛋蛋离开几个月后,汤圆又养了一只博美犬毛毛。毛毛的到来填补了她心里的空缺。这个曾经吃惯外卖的女孩,如今会认真研究狗狗餐食配方,“给它做饭浑身是劲”。她还买了车,每个周末都能带着毛毛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,“以前打车要把狗放在包里,现在它能在后座随便睡”。

如今,常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咨询汤圆关于宠物诉讼的事宜。她会像当初邓凯提醒她的那样,建议对方谨慎考虑。可每一次,她都能从那些坚定的回复里,看到曾经执意走上法庭的自己。

来自云南的90后林念,则让改变有了更具体的模样。送爱犬西贝去宠物医院时,她从没想过那会是彼此相处的最后四天。西贝离世后,林念在网络上咨询了多位兽医,发现医院并没有对症治疗。搜集证据过程中,更让她震惊的是,这家在本地经营十余年的宠物医院,执业兽医竟未完成备案,不具备相关资质。

“他们拒不认错的态度,我不能接受。”林念先后提起两场民事诉讼,委托了司法鉴定,随后又对相关管理部门提起行政诉讼。

有朋友劝林念通过短视频曝光解决,但林念坚持选择法律途径。“诉讼确实很累,但我要通过自己的能力,让他们受到行政处罚。”她自学法律,一遍遍梳理维权逻辑。

她的坚持在那座五线小城引起连锁反应。在她的投诉举报下,当地农业农村局下发文件,对全市动物诊疗机构开展资质核查。

林念的案子也得到“宠物律师联盟”的支持,律师们在群里为她提供法律咨询援助。

邓凯知道,找他咨询的Z世代宠物主人,最终走到诉讼环节的不足十分之一。“都放弃,就不会有进步。”他相信,随着养宠群体越来越大,这些声音会被听到、被重视。

律师杜星月在梳理案例时注意到,北京、上海、安徽、浙江、山东等地法院,已陆续出现支持宠物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判例,金额多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。虽然相较于维权成本,这个数字并不高,但让人看到了可能性。

除了为宠物主人维权,宠物律师们也在试图完善行业规则。崔灿的团队凭借积累的案件和口碑,今年下半年已吸引了不少成都本地宠物行业商家主动寻求合规服务。11月,律师徐千玉和团队受邀参与动物活体运输行业规范讨论,“哪怕没有强制约束力,也能成为后续办案的参考”。

崔灿最近在社媒上分享了林念民事案件的判决书,上面的一段话让他格外珍视:

“宠物不再是单纯的财产或工具,而是饲养者基于情感寄托的陪伴对象,为其提供诊疗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,也构成了饲养者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内容。”

尽管宠物医院已提起上诉,判决尚未生效。但崔灿知道,这样的表述,在以往的宠物纠纷判例中实属罕见。

(文中汤圆、林念为化名)



律师邓凯制作的“宠物律师联盟”冰箱贴及胸针。 资料图片

律师费,更要付出大量时间和情绪成本。是否要花代价去搏一个不确定的结果?

“他们觉得就是死了一只狗,顶多赔一两千元。”汤圆说,自己一开始也想过协商,但对方对小狗的态度让她心寒。

“我打这个官司,不是为了多少钱,而是想争一口气。”汤圆说,这不是“划算不划算”的计算题。短暂权衡过后,她决定走诉讼之路。

邓凯从2008年就开始参与流浪动物救助与宠物普法工作,也代理过一些宠物类案件。去年5月,他尝试在小红书上分享宠物侵权、遗弃、买卖等宠物法律相关案例。近一年多来,他明显感觉到,来咨询宠物法律案件的面孔越来越年轻。

“可能只有年轻人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成本和精力去维权。”律师崔灿说。

选择宠物法律领域,对27岁的崔灿而言,不是偶然的业务试水,而是源于自身的养宠体验,更是看到Z世代群体未被满足的需求。

在家办公时,两只猫总趴在阳台上静静地陪伴。这种温暖,让崔灿格外理解宠物与主人之间的情感,也让他意识到,为宠物维权是一个存在大量需求的新赛道。

今年三月,崔灿在小红书上发布一条宠物领养协议模板的笔记,邓凯刷到后在评论区提了几点修改意见。之后,崔灿主动邀约,希望能和邓凯建立联盟。很快,一个名为“宠物律师联盟”的社群诞生了。不同代际、地域的律师走到一起,如今已有两千多位律师加入。他们在群里共享案例,拆解难题,为各地宠物主人对接本地律师。

95后律师杜星月是宠物律师联盟的发起人之一。身为三只猫的“家长”,她也是最早在社交平台开展宠物普法内容的律师之一。今年上半年以来,杜星月感觉与宠物相关法律咨询的数量明显增加。为此,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专门组建了一支专注宠物法律事务的团队。

为何“较真”

汤圆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蛋蛋的情景。路过宠物店的橱窗时,她一眼就望见角落里那只蜷成一团的小狗,白白小小,像颗柔软的蛋,一下子抓住了她的心。

那是2022年,汤圆刚研究生毕业,留在杭州工作。租完房子,身上只剩几千元。可她还是跟店主商量了半天,花3500元买下这只博美犬,取名“蛋蛋”。

蛋蛋几乎是和汤圆同时“入住”出租屋的。带它回家那天,汤圆的行李还散落在客厅里。

对汤圆和许多同龄人而言,宠物填补的远不止空闲时间。在流动性极高的都市生活里,这只小狗是汤圆奋斗的动力,给了她许多温暖的陪伴。

工作日白天,家里的监控会拍下

蛋蛋守候在门口的镜头;下班回家,它总会兴奋地转着圈迎接,跳起来求抱抱;汤圆拖地时,它会追着拖把来回跑动,像一场游戏……有一次,汤圆因为工作被领导批评,没吃中饭就情绪低落地回家了,但带着小狗出门晒太阳的片刻,就收拾好了心情。“不管受了什么委屈,到家看到它就被治愈了。”汤圆说。

蛋蛋的离开,让汤圆陷入抑郁,下班回到家总看着小狗的照片流泪。对她而言,诉讼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整理证据材料,每一次都像重新撕开伤口。

诉讼之外,汤圆还向当地城管举报对方违法无证养犬。“柴犬属于杭州的禁养犬,我要求对它们行政处罚,错了就是错了。”她在小红书也记录了维权过程。

这种执着,在不少人看来难以理解。“很多年轻的宠物主人维权,连他们的父母都不支持。”崔灿也常听到当事人提起家人的不理解,“我爸妈都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,为什么不好好生活?”

但对Z世代而言,这不是躺平,而是“对自己的情感负责”。一位长期处理相关案件的律师观察到,相比中老年宠物主人,年轻维权者对结果和赔偿金额往往更理性。他们能够接受案件最后判决的金额和实际付出的成本不成正比,更希望对方能够真诚道歉,这是年轻人比较关注的一点。

几周前,崔灿接到一位豚鼠主人的咨询。当事人大学毕业后从朋友那里领养了一只宠物豚鼠,相伴三年。豚鼠生病被带去宠物医院就诊后死亡。后来主人得知,医生开出的是豚鼠的禁用药物。

“本来是小病,却被医生开了致命的药,她气不过,准备起诉。”崔灿理解这种愤怒,当事人并非为了高额赔偿,而是因为自己的伙伴被不负责任地对待。

“95后”律师徐千玉接过一个咨询:一对年轻夫妻筹备婚礼期间,将爱犬寄养在一家有别墅、草坪的寄养机构,但送次日,狗狗中暑死亡。悲剧发生后,寄养机构却一再推卸责任。

“从婚礼现场布置、婚纱照,到后续

“从婚礼现场布置、婚纱照,到后续

家庭装修,他们都考虑到狗狗的存在。”徐千玉说,这对夫妻整理了一个文件夹,里面有几百张图片,从狗狗小时候的样子,到日常相处的点滴,“小狗的离去对这个小家庭的打击,不亚于至亲的别离”。

崔灿还曾遇到一位当事人,狗狗从高中起便陪伴她左右,一路见证她考上大学、步入职场。可一次拔牙手术中,狗狗打完麻醉就再也没能醒来。巨大的悲痛击垮了主人,她患上重度抑郁,一听到与狗相关的话题就会引起肠应激反应,每次和崔灿沟通案情,都忍不住崩溃大哭。

崔灿坦言,面对这类极度悲伤的宠物主人,他希望他们放弃维权,因为诉讼的拉锯可能会反复唤醒痛苦,但他也理解主人的坚持。

“这类案件的关键,是让法官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为一只宠物较真。”崔灿坦言,不少法官起初会将这类纠纷视作“小事”。律师们不仅要厘清事实,更要在法庭上进行一场“翻译”,将一种极度高情感转译为可以被法理接纳的语言。

“情感价值”

现有法律规定,具有人身纪念意义的财物受到损害后,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。在诉讼请求中,汤圆提出5000元精神损害赔偿。与其说是经济诉求,不如说她想看看,法律能否承认那段无法金钱衡量的陪伴。

“许多不养宠的人很难了解这种羁绊”,法官也不例外,邓凯理解这种困境。为此,他检索了二十多起狗咬狗案件中宠物主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。

“许多不养宠的人很难了解